

栉风沐雨终不悔 热血丹心谱华章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部分专家访谈录

王 宣 吴宏娟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7)06-0018-08

陈乔之：“献身东南亚研究事业，我无怨无悔”

本刊编辑部：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乔之：暨大的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起源于1927年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建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当时暨大聚集人才，开展南洋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可以说是开了中国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之先河。抗战期间暨大沦陷，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停办，人员也失散了，其中一些人到了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学会，继续从事东南亚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所以后来我们跟新加坡南洋学会的联系比较多。

本刊编辑部：作为暨大东南亚研究所的前任所长，您能谈谈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创办时的情况吗？

陈乔之：暨大东南亚研究所的兴衰始终同暨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创办到停办到复办再到振兴，一直是起起落落的。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后改称广州分院）就设有东南亚研究组，后建立东南亚研究所；当时兼任暨大校长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主张把东南亚研究所办到暨大，于是1960年东南亚研究所正式在暨大挂牌，人事由暨大管理，而业务仍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科学院主管。当时全所有50多人，聘请了印尼一所华侨中学的校长、归侨教育家司徒赞先生当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后来从广西南宁地

区调来一位专员粟稔先生当副所长。当时东南亚研究所是暨大独一无二的研究所，其地位甚至与暨大平起平坐。文革前所里人员以归侨为主，有一部分是大学毕业生，也有不少是半路出家，所以研究能力比较弱，但是有较强的翻译能力。当时所里的小语种是比较齐全的，有泰语、越语、印尼语、马来语、缅甸语等。

本刊编辑部：据说文革期间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停办，文革后才得以恢复并逐步发展起来？

陈乔之：是的。1966—1970年研究所处于瘫痪状态，1970—1978年研究所因暨大撤销而撤销，直到1978年夏才得以恢复。复办以后，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兼暨大校长与东南亚所所长，主持所里工作的是吴楚副所长，他文革前是中侨委国外司的副司长。还有一位副所长叫胡一声，他是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老红军，后来东南亚从教，也是归侨教育家。当时我们在五一楼那里办公，也就是后来的成人教育学院。这栋楼是1958年建的，没有钢筋，很危险，而且当时连多一把风扇都没有，更别说空调了，条件蛮艰苦的。吴楚做到1982年退休，接着由副所长翁锡辉主持工作。翁是印尼归侨，熟悉印尼情况。复办以后，所里也进了一些人，但年纪偏大，专业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仍以翻译和历史研究为主。

本刊编辑部：据说1985年您毛遂自荐当所长，

* [受访者简介] 陈乔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导、前任所长；温北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前任副所长；黄滋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退休教师；陈森海，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退休教师；曹云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导、所长。

[采写者简介] 王宣，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编辑、编辑部主任；吴宏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编辑。

有这回事吗? 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陈乔之: 我的上任要从 1985 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在广州开年会这件事情说起。当时这个会不是由我们所主办, 但会务组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我们在做, 最后成立新一届理事会, 我们这个老牌研究所不但没人出任副会长, 连常务理事也没当上, 只给翁所长一个理事当。这说明当时我们所的地位已经跌落到什么程度了, 别人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看着我心痛啊! 着急呀! 后来, 暨大当时的人事处副处长陈位彝来找我, 说你们所怎么办? 我说换个头。我就把老研究所留下来的人一个个点名。当然, 其中也包括我一个。我不是想当所长, 但是可以过渡一下, 何况我当时是老研究所留下来最年轻的一员。我想既然要在这个所呆下去, 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搞好。凭着年轻气盛,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这个所的面貌, 于是毛遂自荐并提出三个条件, 而且缺一不可: 第一, 我一定要当第一把手, 这样才能充分施展我的才干; 第二, 副手由我来物色, 主要是考虑班子人员结构要合理, 能团结协作, 勤政敬业, 打开局面; 第三, 所里的工作要按新的思路来做, 就是要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明确主攻方向, 开拓科研新思维, 办出我们自己的特色。这三条人事处全部满足我, 所以我这个所长可以说是自己争来做的, 当然也有研究所老同志的支持, 特别是老领导郭松根同志和学校党委张德昌老书记的大力推荐。

本刊编辑部: 您上任以后研究所确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您主要抓了哪几方面的工作?

陈乔之: 我上任之后, 一是搞好内部团结, 消除“文革”留下来的许多恩恩怨怨, 让大家劲往一处使; 二是找钱, 搞培训, 先后在广州、顺德、江门、鹤山、汕头、梅州等地办专业证书班, 既解决了“菜篮子”问题, 稳住人心和队伍, 又扩大了本所的影响; 三是摆正研究所的方向, 大力抓学术研究, 而为了搞好学术研究, 我们必须走出校门, 开门办所, 面向实际, 面向社会, 面向现代化。通过办培训班, 搞社会调查, 我认识到本所要办出特色, 形成自己的优势, 必须在科研上做到“四个为主”, 即以研究东南亚现状为主, 以研究经济、政治为主, 以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为主, 以研究华侨华人为主。也就是, 突出当代东南亚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与华侨华人研究。另外, 我还强调科研一定要与教学、咨询服务相结合, 这样才能对学校, 对社会多做贡献。

本刊编辑部: 在任期内有哪些事情让您难以

忘怀?

陈乔之: 要说难忘的事, 首先应该是 1990 年的那个研讨会。当年恰逢我们所成立 30 周年所庆, 为了向世人展现我所新的精神风貌, 扩大我所在国内外的影响, 并给暨大脸上“贴金”, 我决定举办一个题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国际研讨会。但是没钱, 学校给不了。我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 人家愿意资助三万美元。由于当时“六四”风波才过去一年左右, 比较敏感, 这笔钱差点拿不到手, 研讨会几乎泡汤。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这笔钱弄到手, 会也开成了, 最后大家皆大欢喜, 我却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了。但有人竟然去告我, 说我出版纪念特刊, 是向外国人出卖一个大情报, 等等, 妄图把我告倒。本来我想在 90 年底就不干所长了, 见好就收, 急流勇退, 这一告, 倒让我觉得自己还不能走, 因为我觉得所里还没有形成宽松的科研环境。于是, 又继续实行改革, 努力加强队伍建设, 扎实开展科研活动, 积极开拓对外交流合作。这样, 1990 年以后, 我所便逐步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从 1990 年到 2000 年间, 我们先后出版了十多种学术著作, 包括“亚太研究丛书”。为了迎接港澳回归, 我还组织了 40 多人, 花了一年多时间编写了史无前例的《港澳大百科全书》并获得第八届中国图书奖。这是最难忘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我们在办好两个硕士点的基础上, 1998 年一举拿下了国际关系学博士点, 这是当时全国高校的第三个国际关系学博士点, 这在我所发展史上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第四件事是 1999 年, 我所受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之托, 再次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在广州南湖宾馆举办题为“面向 21 世纪的东南亚: 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进一步奠定了我所在中外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地位。

本刊编辑部: 回顾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几十年的发展, 您觉得它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陈乔之: 我归结了十条: (1) 开中国东南亚研究之先河; (2) 建立了一支由几代人组成, 内在结构优化, 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 颇有活力的学术队伍; (3) 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专著, 大概有十几种, 还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了有份量的内部研究报告; (4) 大力促进中国各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大团结, 加强了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东南亚研究事业的发展; (5) 举办了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 为推进中国东南亚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6) 办好《东

南亚研究》杂志,使其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7)在巩固原有硕士点的基础上,创办了国际关系博士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高中级专业人才;(8)打开了在台湾招生的路子,打响了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在台湾的招牌,对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与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9)摸索建立了教学、科研、咨询服务三位一体的新体制,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建立新的体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10)为暨大进入211工程系列,为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成为重点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刊编辑部:作为老所长,您认为搞好暨大东南亚所的关键是什么?

陈乔之:(1)国家的兴衰决定东南亚研究事业的兴亡;(2)上级领导是否重视决定东南亚所的地位;(3)本所领导班子尤其是所长是否得力,班子是否团结决定研究所的氛围;(4)办所方针是否正确,队伍科研战斗力是否强大、经费是否充足则决定研究所对社会的贡献力与影响力。一句话,要办好东南亚所,必须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本刊编辑部:在任所长期间,您还一直兼任《东南亚研究》杂志主编,当时的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陈乔之:《东南亚研究》的前身是《东南亚研究资料》1960年创办,文革时停刊,1979年复刊。草创时期碰上经济困难时期,条件很差,印刷的纸张很差,就像草纸一样,但即使是这样的纸张也还很缺乏。当时省里很重视,为了保证暨大《东南亚研究资料》的出刊用纸,连省委机关刊物《上游》杂志都停掉了。当时杂志的编委会成员集中了广东社科界的一批精英,如金应熙、孙孺、朱杰勤等,而且都是由省委宣传部下聘书聘任的。学校领导也很关心,陶铸校长还专门拨了三万美元资助杂志的出版。所以,应该说,文革前几年,即杂志的草创时期,还是做得不错的。当时杂志的研究水平不高,进来的大学生大多是外语系和历史系毕业的,主要搞翻译和历史研究,学术性的论文比较少,自己写的东西几乎没有。所以,初期主要是积累资料,为以后打基础。研究所复办初期,出版经费还有保证,但我上任以后,经费越来越紧张,每出一期要打一次报告给校长,财务处还不肯给,差不多每次都要吵一架。当时所里有同志说,办得那么辛苦,不如不办了,我不同意。我常常说一句

话:“东南亚所在,杂志就要在”,最终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所长以后,经过两年的准备,1987年把它改名为以学术研究为主的《东南亚研究》,1988年又将它从内部发行改为内外公开发行,1992年从季刊改为双月刊,杂志在我手头完成了跨越性的“三级跳”。现在杂志成了核心期刊,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力,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本刊编辑部:您如何看待今后暨大东南亚研究的学科发展?

陈乔之: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了。东南亚地区是我国的邻近,目前又正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各国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在加强交流合作,彼此关系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可以说,现在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大好时机,也是我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发展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不断改革创新,壮大队伍,优化结构,加大科研力度,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样,我校东南亚研究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事业做出更加宝贵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您从事东南亚研究几十年,担任研究所所长十几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陈乔之:我与东南亚研究所相依相伴30年,与东南亚研究融为一体,献身东南亚研究事业,我无怨无悔。早在1966年大学毕业前,我就已内定分配到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后来闹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东南亚研究所撤了,我也到处漂泊,但做梦都还想着东南亚研究所。1978年暨大复办,研究所也复办,在相隔12年之后我才真正踏进研究所门槛。当时暨大宣传部准备留用我,我坚决不干,非回所不可。回到所里,为了把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日以继夜、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一心一意地投入科研。几十年来,我深深体会到,要做好一项事业,必须专注、执着、勤奋、踏实、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东南亚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业,要做好一项如此重要的事业,靠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必须聚集人才,万马奔腾。所以,在担任所长期间,我注意依靠本所同志,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培养人才;努力做到对前辈要尊重,对平辈要平等,对晚辈要多扶持;要与人为善,从善如流;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创造理想的科研环境,建立研究所的“企业文化”,当时叫“团结奋进,开拓创新”。搞好东南亚研究事业,也不能仅靠一个单位的力量,所以我也注意加强与

其他同行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总之,我认为,搞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心胸一定要放宽,即所谓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放眼全球。其实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有很多次晋升副厅、正厅的机会,但都没动摇我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信念,我对东南亚研究所一往情深,总感到还存在一段未了情。人生苦短,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足矣,我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奉献给东南亚研究事业,感到很庆幸很欣慰,尤其看到这个所正在继续向前发展,心里更是无比的高兴。

温北炎、黄滋生:“要搞好东南亚研究,无论做专题研究还是国别研究,都要深入下去”

本刊编辑部:1960年,在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所下的“东南亚经济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在成立之初研究所就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曾一度由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暨大校长兼任所长,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

温北炎:这是因为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起步早,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在国内就已经有一定的地位,在国外也是比较受认可的。

黄滋生: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东南亚研究的力量基本上集中在暨大。而暨南大学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领域开创了一个较好的局面。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在1927年成立时就开始办杂志,出书籍,搞翻译,做研究,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所以,1960年成立的东南亚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利用暨大过去的资源来恢复暨大的东南亚研究,只是研究面要广一些,杂一些。另外,由于当时东南亚某些国家排华,加上新中国刚成立,对南洋华侨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暨南大学来了一批华侨知识分子,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他们对东南亚有较深的认识,通晓当地国家的语言文字,又有一定的中文写作能力,这使暨大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有非常独特而优越的条件。基于这两点,把广东的东南亚研究放到暨南大学并且给予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温北炎:除了培养学生的需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暨大与南洋有上百年的联系历史,跟华侨华人的联系尤为密切。要保持跟他们的关系,促进文化的交流,这个纽带就不能断,而且要非常

重视。所以,上面才投入这么多,而且东南亚研究所一成立级别就很高。当时是由广东省副省长、暨大校长杨康华兼所长,副所长司徒赞是印尼的一位侨领,在华人中威望很高,曾在雅加达的一所著名华侨中学任校长。

本刊编辑部:能谈谈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初期的状况吗?特别是在研究机构、人员、研究成果等方面的情况。

温北炎:从研究人员来说,最大的特点是:研究人员中有一批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他们对东南亚当地国家的国情比较熟悉,懂得当地国家的语言,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国后与原居地仍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研究问题比较客观,比较接近当地实际。另外,我们还有一批国内培养出来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历史专业毕业的,他们中国历史学科的功底很深。这两部分的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个别人是曾在我国外事部门工作过的人员。

黄滋生:研究所成立初期,研究水平一般,而且当时的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做深入的研究,有很多敏感禁区,所以当时我们东南亚研究所主要是做些编译、编纂资料的工作,翻译比较多一点,没有太多实际的研究,少量的一些实际研究也仅限于印尼反华等问题。即使这样,这些研究成果还基本上是以资料的形式出现的。当时所刊的名称都叫《东南亚研究资料》封面上还郑重其事地写着“内部发行”,由此可见当时研究所的工作性质了。当然,缺乏资料,也是研究所未能开展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出书也很少。到80年代初,研究所出版的几种书籍也都是编译性的,非公开出版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陈乔之当所长后才有所改变。

本刊编辑部:主要有哪些改变呢?

黄滋生:主要反映在研究方面,如设立经济问题、华侨华人问题等研究室,对所里的研究人员按研究重点进行调整。同时引进人才,吸收了历史系、经济系的一些研究人员。曹云华、陈恩、刘永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来的,他们根据所里的安排,配合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分别探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进程和经验,写成若干小册子,由所里续集成小丛书出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研究新局面,研究气氛浓厚了,研究成果也出来了,出了不少阶段性的研究文章和最终研究成果——专著。这与过去只专注于编译、编写资料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温北炎:我们还和广州华侨研究会、美国黄兴

基金会等单位合作,围绕“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变迁”这个课题,出了三本书。有《战后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政策》(1989年)、《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1999年)、《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变迁》(1999年)。三本书主编、出版单位不同,出版时间也有一定跨度。这是当时国内比较系统、全面地探讨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变迁的主要著作,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刊编辑部:除了传统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外,在东南亚国别研究方面有没有突破?

黄滋生:当时的研究重点是华侨华人,但也已经为后来的国别研究打下了基础。当时我们的研究人员有各自的研究范畴,例如,王绵长研究泰国,林锡星研究缅甸,廖小健则专攻马来西亚,黄松赞专注新加坡,温北炎关注印尼,我研究菲律宾华侨华人问题。这有利于对国别问题的纵深研究,基础比较扎实。这一点应该在我们以后的东南亚研究中坚持和发扬。一人研究一个国家,有利于出成果,有利于掌握那个方面的发言权。

温北炎:我们所的东南亚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从过去到现在是连贯的。现任曹云华所长就主张:第一,研究人员一定要搞国别研究,这个是基础;第二,每个研究人员都要学习研究对象国家的语言;第三,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要结合研究对象国与所处地区的关系。

黄滋生:不仅仅是国别研究,专题研究也很重要。我们的研究人员一定要有所长,有所专;否则,徒然耗费时日,对学术无所裨益。

本刊编辑部:与其他东南亚研究机构相比,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温北炎:我们的特色主要有:一是历史悠久,其间虽有中断;二是研究人员大多是从东南亚国家回来的,在小语种方面占有优势。

黄滋生:第三点是在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现状研究与中国外交需要的结合上,我们做得较好,我们更注重应用研究。

温北炎:这一点在我这次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就有体会。会上,在论及我国与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问题时,我结合实际,就如何解决中国与印尼友好合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在外交实践中落实等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切合中国和印尼有关部门的需要,因而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黄滋生:第四点,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跟各级侨联、侨办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也较多较深一些。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面

“窄”了一点,但也相对“专”了一点。我们的兄弟单位也各有所长,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多一点,云南社科院东南亚所研究泰国多一点,广西社科院研究越南多一点,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则侧重历史研究。

温北炎:我们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由于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我所在东南亚研究方面也就思想比较开放,视野比较开阔。早在1988年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访问我们所时,就对我所学术思想的开放大加称赞;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访问团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

本刊编辑部:要搞好东南亚研究,二老的经验是什么?

黄滋生:我们那个时候搞研究,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全靠手工操作,也没有出国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现在条件好多了,但不管现在还是过去,要搞好东南亚研究,基本要求都是一样的。首先,无论做专题研究还是国别研究,都要深入下去,不要漫无边际,浮于表面;第二,如果有条件要到对象国做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第三,对年轻人要“压”任务,以任务“逼”他们埋头研究,下功夫从纵的方面透彻了解研究对象的内涵,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我当时48岁开始学英文,也是被逼的。

温北炎:就我自己而言,感受主要有:第一,对印尼的情结比较深;第二,对华侨华人的情结比较深;第三,对东南亚研究所的情结比较深。我现在还天天上网,浏览、收集印尼资料,紧紧跟踪印尼的国情及政治、经济发展,现在退休了,仍尽力做一些研究工作。

陈森海:“怎样善待作者和稿件始终是我最为用心、最为用功的事情”

本刊编辑部:您曾经是《东南亚研究》杂志的主编,能谈谈杂志的发展情况吗?

陈森海:《东南亚研究》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所刊,1959年创刊时叫《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不久改名《东南亚研究资料》1987年更名《东南亚研究》作为研究所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份杂志始终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影响,它见证了研究所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从刊名、办刊宗旨、办刊方针、期刊内容到发行方式等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办所方针。

在《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和《东南亚研究资

料》时期,杂志承担着积累资料、培训人才的重任,在研究所初创时期的“奠基”工程——资料建设和队伍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从事编辑出版的前辈,他们良好的工作作风、学风和治学精神(也是当年研究所的良好风气)深深地影响着后继者,我就是其中之一。

杂志更名为《东南亚研究》并由内部发行改为海内外发行,这是全面振兴研究所的一大决策,刊物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拐点,为完成从低层次的资料性向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性过渡打下了基础,成为外界观察、认识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窗口。

本刊编辑部:《东南亚研究》杂志的特色主要是什么?

陈森海:我没有与其他同类杂志作过比较,仅从本刊载文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主要有:浓重的理论色彩、宽广的视野、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性、较高的学术质量、大量外文资料的运用、对传统思维模式、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突破,等等。

本刊编辑部:期刊的定位对一份杂志来说十分重要。您如何看待《东南亚研究》的定位?

陈森海:首先,一份杂志的定位定性必须始终如一,对确定的发展目标要坚定不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作为反映其学术水平的所刊,《东南亚研究》杂志必须是学术刊物。更何况以其刊名,理应属于学术性的刊物。刊物的成长成熟有一个过程,一时的学术属性不到位,并不影响原来定位定性应有之义,反倒能更加清楚地向办刊者指明方向,要求办刊者必须不懈努力,推进刊物最终到位,达到学术的高度,实现“学术刊物”的目标。当年决定把刊名从《东南亚研究资料》改为《东南亚研究》就表明了这样的决心。

第二,要有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办刊理念原则。比如说,真心实意地尊作者为“衣食父母”,就能赢得更多作者的信任和支持,为刊物提供更多更好的稿件;扶持奖掖新生力量,可以为刊物注入新的活力;鼓励提倡学术争鸣,以求把学术研究向纵深推进;坚守职业操守,秉公办刊,不谋私利,不看面子看稿子,就能够排除多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纯洁刊物的学术性。有了体现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办刊理念原则,就为办好学术刊物提供了有利的思想保证。

最后,就是要在具体工作中努力认真地贯彻实践这些理念原则。

本刊编辑部:那么在具体的办刊过程中是如何践行这一理念的呢?

陈森海:做主编期间,我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实践视作者为“衣食父母”的理念上面。其中,怎样善待作者和稿件始终是我最为用心、最为用功的事情,工作量也是最大的。对作者,我始终怀着感恩之心,抱着平等尊重、诚恳热情、谦虚好学的态度,绝不摆架子,不打官腔,不说套话空话。与作者的交往,不是仅仅用冷冰冰的用稿或退稿通知单了事,而是坚持亲笔写书信或约见面谈。做到每稿必复,复必言之有物。比如退稿,要说清理由,并为其今后来稿做些指引,力求作者理解,不生怨气。当时贺卡还不怎么流行,但每到新年编辑部都不会忘记给一些作者寄上一张贺卡,写上感谢的话。采用稿件,则要说出对文章的评价,或提出一些修改建议;自己不懂的地方,比如一些专业用语,就请教作者。总之,希望以诚心和这种工作方法,能够与作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使杂志能团结起一批对刊物有认同感、关系相对稳定的撰稿人,以保证杂志“衣食无忧”,“丰衣足食”。

同时,我们还特别留意去发现一些具备学术研究潜质和良好学术品格的新生代学者,帮助他们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比如说,对他们的稿件会更加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我曾经亲自动手查资料,与作者一起从文章的观点论证、资料运用到写作构思等方面进行探讨,帮助他重写改写文章。这样,通过与作者的频繁沟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对一些投缘的作者,平时也坚持主动与之保持联络,一起谈论读书做学问,讨论学术问题,商量如何办好杂志,乃至个人之间交流思想,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对杂志有一种认同感,对杂志获得“锦衣玉食”,提高学术质量有着重大的意义。比如现在学术有成的张锡镇、王士录、于向东、张卫平以及现居海外的刘宏、粟明鲜、陈杰等等,正是他们的作品,为当年的《东南亚研究》生色增辉,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学术品位和社会地位。

本刊编辑部:虽然退休了,但您仍时时关注着杂志。对杂志以后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陈森海:从杂志本身来讲,很简单,我感到:
(1) 应该继续提高杂志的学术含量和学术深度。
(2) 注意适当控制研究地域的涵盖面,使之有别于其他国际问题研究刊物。
(3) 要考虑国外读者,把出版外文版的《东南亚研究》作为长远目标,可以先尝试出两本专刊、集刊或精选刊。一个单位做不了,几个单位联合起来做,有没有可能?
(4) 应考虑如何办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特色。
(5) 要加强计划性组稿,多一些专题研究。如去年第四

期的“中国东南亚研究评述”和今年第四期的“纪念东盟成立40周年”就很好，这类专栏有创意，也有冲击力。我所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中国东南亚研究状况，并已出有专论专著。这个课题非常值得作为研究所的重点项目，继续做下去，做出成绩。(6)要加强论著评述和学术争鸣。

本刊编辑部：在几十年的办刊生涯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森海：常言道“稿为媒”，“以文常会友，为德自成邻”，很多作者因稿缘而与《东南亚研究》杂志乃至研究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大多数甚至至今都未见过面，但他们的言行至令让人难忘。他们有的为杂志的发展出谋献策，有的参与课题项目，有的提供资料，通报信息，有的协助公关，有的引荐作者和稿件，有的自荐当编外编辑，有的帮忙审稿、翻译文章，有的设计杂志封面。在杂志经费拮据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说服其女儿，为杂志争取到第一个广告；北京一位老专家主动提出不要稿费；福建一位老教授得知研究所一位同志家有不幸，还来信表示慰问激励，说“想想还有我这位朋友”，并慷慨解囊。二十年来回想起这些感人和事，常常叫人动容，也倍感珍惜。我想借此访谈机会，为他们对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杂志的奉献，再一次衷心地发声：“谢谢！”许多人当年对我本人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君子之交的情谊，也深深烙在了我的心底，叫我终生难忘。但愿他们继续做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杂志的好朋友。

曹云华：“作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继承和发扬我校东南亚研究的传统，占据我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前沿”

本刊编辑部：您2000年担任所长以来主要抓了哪些工作？

曹云华：我是2000年开始担任所长的，前后已经连续三任，现在是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了。我已经破例了，按照学校的规定，一般都是两任，不能超过三任。此前曾经担任过一任副所长和三任支部书记，可以说，我的青春和最好的年华都已经献给东南亚研究所了。当然，也是东南亚研究所培养了我，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东南亚研究所培养的结果，东南亚研究所和谐的人文环境、良好的研究条件，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基础。我上任以

后所做的工作，如果说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也是全所老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实事求是地说，东南亚研究所有今天的成就，是前后几代人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我个人的力量 and 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这几年研究所经历了一些事件，我仍然记忆犹新。2000年，围绕申报文科基地的事情，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论调：“东南亚研究所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学校养不起这么多研究人员”。针对这些论调，我们并不是消极悲观地应对，而是进行反思和积极的改革，做出成绩来给人家看，让事实来证明东南亚研究所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是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的，这就是我们在2002年实行系所合一的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原因。实践证明，我们成立国际关系学系，增设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是对的，我们找到了新的增长点。这几年，我们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培育这个新的增长点上面，全系共同努力，把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我校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专业，得到了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好评。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主要抓了几件事：一是抓研究生的培养过程，重点放在正规化和制度化方面，建章立制；二是把传统的东南亚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鼓励研究人员学习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传统的学科焕发青春和活力；三是花大力气培养青年研究人员，这几年，我们所引进了不少青年教师，他们的表现都是不错的，所里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包括到国外访问进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等等。

本刊编辑部：作为现任所长，您对研究所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曹云华：这几年，研究所发展的势头很好，2002年被国务院侨办批准为重点学科，今年又被确定为广东省重点学科，我校“十一五”发展规划也把东南亚研究确定为需要重点扶持的传统特色学科，国际关系学专业则被确定为需要重点发展的优势学科，我们最近还正在申报广东省重点文科基地。学校领导对我们研究所和国际关系专业也十分重视，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些都为我们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在学校的领导下，通过我们全所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继续发展，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想，我在这一个任期内重点要做的工作，就是扶持年青人，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我希望我校的东南亚研究事业后继有人，一代比一代强，一代超过一代，这是

我们事业的希望所在。

本刊编辑部: 在长期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工作中, 您有哪些体会?

曹云华: 如果说我在研究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 那都是勤奋的结果。我自己认为我这个人并不聪明, 智商也不算高, 最多也只能算是中等, 但是我比较勤快, 我相信勤能补拙的道理。我从 1990 年调入研究所工作起, 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出版专著十本 (包括 5 本独著、3 本合著和 2 本主编), 这都是我勤奋工作的结果。当然, 我之所以能够在研究工作上取得这些成绩, 还得感谢研究所良好的研究环境。在我们研究所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 大家都把心思放在教学与科研上面, 不算计人、不整人, 有矛盾、有意见当面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希望这个传统今后能够发扬光大。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有几个老同事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不敢忘怀。陈森海同志是其中一位, 他在负责《东南亚研究》杂志的实

际工作期间, 培养了很多新人, 我也是他培养的新人之一, 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 对朋友诲人不倦的态度, 永远值得我学习。陈乔之同志是老所长, 他为研究所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那种勇于开拓的精神、开放务实的工作态度, 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的任上, 其实也继承和发扬了很多他为研究所留下来的东西。

我还要借这个机会向我们所的年轻人说几句话, 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你们也很幸运, 能够在东南亚研究所这个和谐、宽松的小环境中工作和学习。我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环境, 让东南亚研究所的好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今年是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成立 80 周年, 她的成立, 开创了现代中国东南亚研究之先河。作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后人,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继承和发扬我校东南亚研究的传统, 占据我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前沿。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先辈, 无愧于暨南大学的光荣历史。

【责任编辑: 邓仕超】

(上接第 17 页)

[3] 王赓武: 《新加坡和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两种不同观点》, 《南洋问题研究》2004 年第 2 期。

[4] 黄松赞: 《“文革”前后的研究所》, 《东南亚研究》2000 年第 5/6 期。

[5] 同 [4]。

[6] 白云: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学者及其论著影响力分析——基于 CSSCI 的分析 (2001—2005)》,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 4 期。

[7] 叶波: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机构 and 地区影响力分析——基于 CSSCI 的分析 (2001—2005)》,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 4 期。

[8] 张振江: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成就、视角与问题——以三家高校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为基础》, 《东南亚研究》2006 年第 4 期。

[9] 曹云华: 《广东的东南亚研究》, (新加坡) 黄朝翰、曹云华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成就与挑战》,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 第 67 页。

[10] 同 [8]。

[11] 同 [9], 第 77 页。

[12] 邵旭: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概况和期刊学术影响分析——基于 CSSCI 的分析 (2001—2005)》, 《世界经济与

政治论坛》2007 年第 4 期。

[13]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简介》, 陈乔之、黄滋生、陈森海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现状与展望》,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 134—136 页; 陈乔之: 《情之所系、力为之用: 我在东南亚所的 22 个春秋》, 《东南亚研究》2000 年第 5/6 期。

[14] 同 [7]。

[15] 对中国东南亚研究进行不同时段总结的代表文献分别见梁志明、张锡镇、杨保筠《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 《南洋问题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刘永焯: 《中国东南亚研究: 回顾与前瞻》,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陈乔之、黄滋生、陈森海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现状与展望》, Huen P. Lin Pui Library Resources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Some Observation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88, pp. 4—13.

[16] 关于西方国家的东南亚研究, 请参见 Anthony Reid e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acific Perspectives* 2003 Cynthia Chou & Vincent Houben, ed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Singapore, 2006.

【责任编辑: 王 宣】